



余鹏飞 著

三國經濟史

河南大学出版社

(豫)新登字第 09 号

三 国 经 济 史

余鹏飞 著

责任编辑 西 伯

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襄樊日报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75 字数:320 千字

1992 年 5 月第 1 版 199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定价:6.00 元

ISBN7-81018-718-X/K·85

序

三国是秦汉封建统一中央集权制国家建立后,出现的第一个分裂时期,也是中国历史发生急骤变化时期。从国家的外部形态讲,从一个统一的国家,分裂为三个鼎足而立的政权,而这三个政权又都各有其突出的建树,当然也各有其值得警戒的失误和教训。因此对三国史的研究,也就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热门课题之一。对三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研究,都有很多的论文公布于世,其中尤以对三国的人物研究论文最多,如对曹操、诸葛亮的研究,其论著之多,在中国古代史的人物研究中实属少见。但是,尽管三国史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热门课题,而研究三国史的学术专著并不多见。特别是全面研究三国经济史的专著更属凤毛麟角,除陈啸江先生在解放前出版过一本约八万字的《三国经济史》之外,至今不见有其他《三国经济史》问世。陈啸江先生的《三国经济史》印数不多,流传不广,现在很少有人能见到,所以全面研究三国经济史的学术专著,实为当前所急需。

全面研究三国经济史专著如此难产,是不是由于三国的经济史没有研究价值呢?不是,绝对不是。三国时期的经济变化情况,是中国古代其他时期所少见的。从经济区域变化情况讲,从秦汉时期黄河流域一个发达的经济中心区,演变为黄河流域、四川、长江中下游三个发达的经济区。原来的北方经济区,即黄河流域经济区,由于遭到东汉末年的战火摧残,走的是从破坏到恢复、发展的道路;南方新兴起的两个经济区,即四川,长江中下游经济区,走的

则是开发、发展直线上升的道路。三国时期,国家虽然处于分裂状态,但从经济领域的全局观察,却处于发展之中,中国的经济中心已开始逐渐南移。从土地制度的变化情况讲,这一时期土地私有制受到抑制,由于国家力量的强烈干预,土地国有制出现暂时的回潮。以土地国有制为前提的屯田制(包括军屯和民屯),已成为魏、蜀、吴三国普遍推行的正规土地制度。当然魏、蜀、吴三国施行屯田制的成效各有不同。曹魏最为成功,屯田制对于促进北方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对于保障军粮供应起了巨大作用。东吴其次,屯田对江东农业的开发,对于保障军粮供应起了一定作用。蜀汉最次,屯田仅是为了保证部分军事需要。三国除施行屯田制外,小农土地私有制、地主大土地私有制仍然普遍存在,只是土地兼并不甚激烈,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受到抑制。从生产关系讲,封建租佃制已被政府所确认,并有了新的发展。租佃制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存在,西汉时期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在三国以前,政府并不承认地主有占有佃客的合法权利。曹魏政府所颁布的“赐公卿以下租牛客户制”及东吴政府的“赐客制”,都承认了地主占有佃客的合法权利,而屯田制的生产关系,实际是国家租佃制。租佃制的合法化,从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考察,是进步的表现,对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有积极作用。不过,由于战乱的原因,三国时期奴隶制残余也出现暂时的回潮。在战乱中,有大批贫苦人民被掠卖甚至是自卖为奴,特别在蜀汉统治地区,“奴执耕稼,婢典炊爨”还是较为普遍的现象。从赋税制度讲,三国时期也有明显的变化,秦汉时期对编户齐民推行田租口赋制,其特点是田租轻,人头税重,并且是田租按产量征实物,人头税按人口数征钱,人民增加产量,增加人口,就多交租税,曹操平定河北后,颁布了田租户调制,规定“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其特点是按亩出租,接户出调,皆有定额,增产增人,不增租调,而且皆交实物,这在当时具体历史条件下,对促进生产、促进人口增殖有一定积极作用,这也是两晋南北朝时期所普遍采用的租

调制度。从生产力水平讲,三国时期也有明显提高。如耦犁耒车及区田法的推广,双季水稻的种植,水排冶铁的发明,火井煮盐的出现,八蚕之绵的培养,蜀锦织作技术的提高,五层战船的创建,木牛流马的使用,十矢连弩的改进,充分反映出三国时期的农业、手工业生产都有相应的发展,水陆交通运输工具都有很大的改进,特别是服务于战争的军事工业,更有突出的发展。在商业方面,吴国最为活跃,其对内外贸易规模均超过两汉水平。蜀国的商业始终处于平稳发展状态,只有北方的魏国曾一度废除货币,而实行以物易物,商业呈现萎缩,但到明帝以后就走上正常发展轨道。总之,三国的经济各有千秋,很值得作一番比较研究,找出其各自发展的轨迹。

话又说回来,三国经济史既然如此值得研究,那么又为什么很少有人去全面研究三国经济史呢?这大概是由于三国经济史的大课题,已被人反复研究过,而小课题资料少、零碎而又分散,用力多而成果甚微,而全面研究三国经济史,既避不开被人反复研究过的大课题,又必须涉及资料零碎分散的小课题,故很少有人肯于问津。余鹏飞副教授则是知难而进,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广泛搜集三国经济史有关文献资料和文物考古资料,对三国经济进行了全面、深入、系统、细致地研究。如对汉末人口迁移的方向和迁徙的原因,对屯田制实行的背景、时间和组织系统,对三国商业发展状况和货币使用等问题,均作了清楚,详细的阐述,尤其对曹操、诸葛亮、孙权的经济思想的分析,对曹魏军屯四种类型的区分,对刘表在荆州的评价,均有独到见解。当然所谓独到见解,不一定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见解,但是,任何一本有价值的学术专著,都不应该是人云亦云,鹦鹉学舌,而必须有与众不同的见解,因为经过对问题的独立钻研、独立思考,而提出来的独到见解,可以给人以启迪,可以给研究者打开思路,可以使人对问题的研究向更深层次开展,因此功不可没。我相信余鹏飞副教授的《三国经济史》问世,

必将对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特别是对三国史的研究,起到推动作用,甚至可以这样说:对现在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会有某种借鉴意义。

朱绍侯

1992年2月于开封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变乱中的社会经济	(4)
第一节 封建割据政权的出现	(4)
第二节 人口的急剧锐减和人民的空前迁徙	(8)
一、人口的急剧锐减	(9)
1、战祸造成人口非正常死亡	(12)
2、严重的自然灾害吞噬劳动人民	(16)
3、人口自然生殖率的下降	(21)
二、人民的空前迁徙	(22)
1、人口大迁徙的原因	(22)
2、大迁徙的方式	(25)
3、人口大迁徙的方向	(28)
第三节 土地荒芜、生产凋敝	(36)
第二章 曹操、诸葛亮、孙权的经济思想	(41)
一、曹操的经济思想	(42)
1、重农思想	(44)
2、抑奢崇俭思想	(45)
3、社会理想	(48)
二、诸葛亮的经济思想	(49)
1、务农殖谷、闭关息民	(51)
2、盐铁官营、蜀锦为主	(54)

3、轻徭薄赋、使百姓安居·····	(56)
4、提倡节流积蓄、反对奢侈风气·····	(58)
三、孙权的经济思想·····	(60)
1、增广农田、宽赋息调·····	(60)
2、建置官营作坊、发展手工业·····	(64)
3、优遇豪强地主、发展田庄经济·····	(65)
第三章 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70)
第一节 重农政策提到首要地位·····	(70)
一、耕籍田、行重农典礼·····	(70)
二、颁诏书、宣农本之重要·····	(71)
三、轻徭薄赋、休养生息·····	(77)
第二节 人口从流散到安集·····	(79)
一、吴国的户口数·····	(81)
二、蜀国的户口数·····	(86)
三、魏国的户口数·····	(89)
四、人口剧增的原因·····	(95)
1、战乱较少、社会趋向稳定·····	(96)
2、自然灾害减少,积极救荒·····	(97)
3、招怀流民,增殖生育·····	(99)
第三节 土地制度的新发展·····	(105)
一、以屯田制为主体的封建国有土地制·····	(106)
1、屯田制实行的社会背景·····	(108)
2、屯田制实行的时间·····	(128)
3、屯田的类别、区域和组织系统·····	(131)
4、推行屯田制的历史作用·····	(237)
5、三国屯田制的废除·····	(242)
二、大地主土地私有制·····	(247)
三、自耕农土地私有制·····	(262)

第四节 新租调制的实行.....	(267)
一、曹魏的租调制度	(270)
二、蜀汉的租调制度	(279)
三、孙吴的租调制度	(280)
四、三国时期的杂税	(281)
第五节 水利灌溉工程的发展.....	(283)
一、曹魏的水利工程	(284)
二、孙吴的水利工程	(295)
三、蜀汉的水利工程	(299)
第六节 农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种植.....	(300)
一、水稻种植范围的扩大	(301)
二、蚕桑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	(302)
第七节 耕作方法的改进和产量的提高.....	(303)
一、牛耕技术和耒犁的推广	(303)
二、新型农田灌溉工具的出现	(309)
三、农业产量的提高	(310)
第四章 手工业生产和工艺技巧	(313)
第一节 盐业生产.....	(313)
一、蜀汉的制盐业	(314)
二、曹魏的制盐业	(316)
三、孙吴的制盐业	(317)
第二节 冶铁业.....	(318)
一、曹魏的冶铁业	(318)
二、蜀汉的冶铁业	(320)
三、孙吴的冶铁业	(321)
四、冶炼技术的提高	(322)
第三节 纺织业的发展.....	(324)
一、丝织业	(324)

二、织布业	(329)
三、纺织技术的进步	(330)
第四节 造船业	(330)
一、造船工场遍布各地	(331)
二、船舶种类繁多、船队庞大	(334)
三、造船技术的提高	(338)
第五节 其它手工业和工艺技巧	(340)
第六节 手工业者状况	(345)
第五章 商业、货币和物价	(347)
第一节 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的发展	(347)
一、魏蜀吴三国商业的恢复和发展	(347)
1、曹魏统治下北方商业的复苏	(347)
2、蜀汉商业的活跃	(349)
3、孙吴江南商业的发展	(350)
二、三国地方政权之间的通商	(352)
三、三国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贸易	(355)
1、曹魏与东北、西北各族的贸易	(355)
2、蜀汉与西南夷各族的互市	(358)
3、孙吴与越族、夷洲少数民族之间的贸易	(358)
四、三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360)
1、曹魏的对外贸易	(360)
2、蜀汉的对外贸易	(362)
3、孙吴海上贸易的兴盛	(362)
第二节 货币制度	(364)
一、曹魏的货币制度	(364)
1、五铢钱的兴废	(364)
2、实物货币的复兴	(365)
二、蜀汉的货币制度	(368)

1、直百五铢	(368)
2、传形五铢	(369)
三、孙吴的货币制度	(370)
1、币值面额大	(370)
2、钱物并行	(372)
第三节 物价	(375)
第六章 交通和都市	(378)
第一节 陆路和水路交通	(378)
一、陆路交通	(378)
二、水路交通	(381)
第二节 都市	(384)
一、洛阳	(385)
二、长安	(387)
三、成都	(388)
四、邺	(388)
五、建业	(391)
后 记	(395)

绪 论

中国古代封建专制主义统一中央集权制度,从秦朝建立,历经西汉、东汉逐步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封建经济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但到东汉末年,政治经济制度却发生了急剧变化。政治上的宦官、外戚擅权,经济上的豪族地主田庄经济的发展,使社会矛盾剧烈激化,纷纷烈烈的黄巾农民大起义以摧枯拉朽之势,沉重打击了豪强地主阶级,东汉政权名存实亡。在镇压农民大起义中,豪强地主与地方官吏相互勾结,乘机扩大势力,出现无数个封建割据政权,社会出现了大动荡、大分裂,历史进入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

三国是这一时期的开始。从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 190 年)董卓之乱爆发,到晋太康元年(公元 280 年)晋灭吴统一南方,前后达九十一年。这九十一年,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虽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它是一个多变的曲折的阶段,走的是一段充满急流险滩、峰回路转的航程。我们看到这一时期,在分裂中有竞争,在动荡中有变革,在破坏中有建设,在黑暗中有光明。它把两汉以前的古老的中国文化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它使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出现了新的历史转机。

三国时期的历史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 190 年)到延康元年(公元 220 年)为战乱时期。各地封建割据势力相互兼并,发动大小战争几百次,整个社会处于大混乱、大动荡。广大人民倍受战争灾难,流离失所,生活极度贫困,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第二阶段从魏文帝黄初二年(公元 221

年)到吴天纪四年(公元 280 年)为三国鼎立、治世并逐步走向统一时期。魏、蜀、吴政权的相继出现,使一度混乱的局势趋向稳定。三国统治集团都意识到军事对峙的长期性,纷纷将注意力集中于国内的政治经济事务,为安定社会秩序、恢复与发展经济,作出了各自的努力。他们对内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对外实行均衡外交,从而导致了中原经济的复苏,江南与西南地区封建经济的扩大。社会经济的逐步发展,为继位的“守成者”提供了日益丰富的享受品,统治集团的贪欲与权势也随之膨胀,那些忧国的忠臣们虽屡次进谏,拼命敲响警钟,也不能使沉溺于奢侈荒淫的君主猛省回头,致使国弱民贫日益严重。蜀汉、孙吴如此,曹魏也不例外。正如孙吴屯骑校尉张悌所分析的:“今蜀阉宦专朝,国无政令,而玩戎黷武,民劳卒弊”,“(曹)丕、(曹)睿承之,系以惨虐,内兴宫室,外惧雄豪,东西驰驱,无岁获安,彼之失民,为日久矣。”他发出感慨说:“吴之将亡,贤愚所知,非今日也。”就在这时,“司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任贤使能,各尽其心……其威武张矣,本根固矣”^①,最后篡夺曹魏政权,乘机伐蜀灭吴,统一了全国,建立了新的政权。

恩格斯说:“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经济的条件和资源帮助‘暴力’取得胜利。”^② 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政治上的分裂、统一,再分裂、再统一,是与经济上出现的衰落、繁荣,再衰落、再繁荣密切相关的。经济的发展与否对政治上的统一与分裂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何使一度衰落的经济重新得到恢复和发展,这是历朝统治者建立新的朝政,巩固其政权统治,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

① 《三国志》卷四八《孙皓传》注引《襄阳记》。

②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 211 页。

“三国鼎立”^① 局面之所以能维持达六十一年之久(从曹丕于黄初元年即公元 220 年建立魏国至晋太康元年即公元 280 年晋武帝司马炎灭吴),这是由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地理和人才等均势所形成的。而诸因素中最主要的是由这一时期三个独立经济区域出现的结果。到三国末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三个经济区域彼此贸易往来的扩大,统一经济联系的加强,加上军事外交等方面斗争的促进,政治上的统一便代替了割据政权的分裂,西晋统一王朝便随之建立。这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此,研究三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不仅有助于我们对三国间进行的政治、军事和外交等方面斗争的成败有更深刻的理解,而且还可以从魏、蜀、吴三国各自发展社会经济的特点中得到启迪和借鉴。

^① “三国鼎立”一词最早见于宝鼎元年(公元 266 年)孙吴镇西大将军陆凯对孙皓所言。见《三国志》卷四八《孙皓传》。

第一章 变乱中的社会经济

第一节 封建割据政权的出现

中国历史上任何封建政权兴盛时期的出现,都是建立在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反之,统治阶级的腐朽,社会矛盾的发展和激化,对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又起着阻碍和破坏的作用,东汉政权的兴亡就是明证。

西汉末年,由于王莽的统治,致使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等破坏力量不断出现,从汉高祖刘邦建国二百多年来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至此都化为灰烬。“王莽末年,天下大旱,蝗虫蔽天,盗贼群起,四方溃畔。”^①“战斗死亡,缘边四夷所系虏,陷罪,饥疫,人相食,及莽未诛,而天下户口减半矣。”^②“元元无聊,饥寒并臻,父子流亡,夫妇离散,庐落丘墟,田畴芜秽,疾疫大兴,灾异蜂起。……四垂之人,肝脑涂地,死亡之数,不啻太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妇,咸怀怨怒。”^③面对阶级矛盾如此尖锐,社会经济如此残破不堪,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为了在废墟上建立牢固的政权,便在政治上采取“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从建武二年(公元26年)至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先后颁布了六次释放奴婢、三次禁止虐杀奴婢的诏令。“民有嫁妻卖子欲归父母者,恣听之。敢

① 《后汉书》卷十四《齐武王传》。

② 《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③ 《后汉书》卷二八《冯衍传》。

拘执，论如律。”“王莽时吏人没入为奴婢不应旧法者，皆免为庶人。”“其杀奴婢，不得减罪。”^①又下令减轻田税，“收见田租三十税一”^②，用“假民公田”办法安置流民，以赈济和减刑戍边来缓和阶级矛盾。同时对各级官吏进行考察，或黜免，或提拔，赏罚分明。通过光武君臣三十多年的努力，到光武后期以及明、章二帝时，社会基本稳定，人民免去了“兵革之祸”，而有“乐生之念”，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从而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天下安平”，“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牛羊被野”，“吏称其官，民安其业”，“户口滋殖”^③，人口逐年增加，史载从光武中元二年（公元 57 年）到和帝元兴元年（公元 105 年）人口由二千一百万七千八百二十人，增加到五千三百二十五万六千二百二十九人^④。

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说：“天下易动而难静”^⑤。“光武中兴”的史实告诉我们：历史上由大乱走向大治，必需经过一番整顿，通过调整繁杂的阶级关系，解决各种社会矛盾，才能求得一个安定的局面。刘秀顺应历史潮流做到了这一点，因此能够“拨乱反正，以宁天下”^⑥，这是一条很重要的历史经验。

但是到了东汉中后期，随着政治的日益腐败，土地日益高度集中，出现了大批田庄，豪强地主与官僚地主的势力日益壮大。东汉著名政论家仲长统曾对豪族地主经济势力作过这样的描述：“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伎乐，列乎深堂。宾客待见而不敢去，车骑交错而不敢进。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

① ②《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下同。

③ ⑥《后汉书》卷二《孝明帝纪》。

④ 《后汉书》卷二三《郡国志》引《帝王世纪》。

⑤ 王夫之：《读通鉴论》。

可饮。”^①东汉政论家崔寔在《政论》一书中也有深刻地描写：“上家累巨亿之资，斥地侔封居之土，……故下户踣跣无所瞻足，乃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率妻孥为之服役。”^②从仲长统和崔寔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了东汉末年豪族地主政治经济实力之雄厚。而官僚地主在东汉政权的保护下，通过察举、征辟选官制度，逐渐垄断仕途，世代皆为高官。由于选官皆以门第与资财为主要条件，所以他们不仅在政治上有强大的势力，而且拥有广大的山林和田园，占有众多的奴婢和佃客，门生故吏遍天下。中常侍张让占有“京畿诸郡数百万膏腴美田”^③，出身于“四世三公”之家的袁术“后宫数百皆服绮縠，余梁肉”^④。

与此同时，东汉朝廷随着皇帝荒淫短寿，小皇帝年幼登基，中央政权相继为外戚和宦官轮番把持，引起社会矛盾激化，最后，外戚、官僚、太学生联合形成“党人”集团反对宦官专权。宦官进行反扑，对党人进行镇压，于是出现两次“党锢之祸”。

此外，东汉末年自然灾害特为严重。据不完全统计，整个东汉时期大的水灾共发生二十七次，而桓帝、灵帝时就发生十三次，占水灾总次数的二分之一；大的旱灾共发生十七次，桓、灵时期就有六次，占旱灾总次数的三分之一强。

由于人祸天灾，劳动人民生活更加贫困，甚至倾家荡产，四处流亡，“流离沟壑，嫁妻卖子”，全国到处出现“地广而不得耕，民众而无所食”的凄凉景象。广大人民走投无路，被迫揭竿而起，举行农民起义。据不完全统计，从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到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各地发生规模较大的起义就达六十多次。虽然

① 《后汉书》卷四九《仲长统传》。

② 《通典》卷一《食货典·田制》。

③ 《三国志》卷六《董卓传》注引《典略》。

④ 《三国志》卷六《袁术传》。